两汉谶纬考论

张 峰 屹

摘 要:“谶”与“纬”的思想观念,在两汉时期有一个由分立而化合的过程。古今学人往往笼统讲说汉代“谶纬”,并不符合实际。谶验观念始自远古,至汉末一直存续,从未间断。谶至汉初,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了新变——以谶辅经、以谶释经。此一现象肇始于文帝时,至汉末一直存在。东汉明、章之后,以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《白虎通》为标志,确立经、谶互释为正统思想。而其远源,实在汉初。考察谶、纬之发生演变史,实际上有谶而无纬。东汉后期出现的所谓“纬”,实际就是谶,其实质是以谶“纬”经。历来通行的“谶纬始自哀、平之际”的论断,不仅曲解了张衡,也淆乱了“谶”、“纬”的概念,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。

关键词:汉代;谶纬;谶纬起源;谶纬名实;以谶纬经

引论:张衡《请禁绝图谶疏》的确切涵义

历代学者关于谶纬之起源的论断,姜忠奎《纬史论微》卷一析为“以时代为断者”、“以人物为断者”、“以典籍为断者”三类[①],共罗列了三十种说法;钟肇鹏《谶纬论略》第一章《谶纬的起源和形成》条别为十二种[②]。可见其持说纷纭之状。实际上,谶纬起源问题还与对其性质的判断紧密相联,这就更加复杂。

凡古近诸多说法中,张衡给顺帝的上疏(原文载《后汉书·张衡列传》,严可均《全后汉文》题为《请禁绝图谶疏》),因其论说图谶问题较早并且较为系统,最受推重[③]。这篇上疏,以下几个意思甚明:

1.“律历(观星辰逆顺,寒燠所由)”、“卜筮(察龟策之占,巫觋之言)”、“九宫”等“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”的书,叫做“谶书”;它是“圣人明”、“智者贵”的书。

2.“谶书”起源于秦汉之前,只是当时懂得它的人很少;西汉成、哀之前,“谶书”寝息不闻。

3.成、哀之后复起的“图谶”,有或不合经、或自相矛盾、或使用材料错谬之处。

4.“《河》、《洛》、《六艺》,篇录已定,后人皮傅,无所容篡”[④],这应该是指汉代谶纬篇目已经在刘秀中元元年(56)确定,并宣布于天下,后人不得傅会、篡改。

5.“且律历、卦候、九宫、风角,数有征效,世莫肯学,而竞称不占之书”云云,联系上文“圣人明审

作者简介:张峰屹,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(天津 300071)。

基金项目: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东汉文学思想史”(14BZW026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姜忠奎:《纬史论微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5 年,第 18 – 37 页。

② 钟肇鹏:《谶纬论略》,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1 年,第 11 – 21 页。

③ 据张震泽考证,此疏作于顺帝永建元年(126)以后,阳嘉二年(133)以前。见张震泽:《张衡诗文集校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 年,第 363 页。

④ 李贤注:“衡集《上事》云‘《河》《洛》五九,《六艺》四九’,谓八十一篇也。”与《隋书·经籍志一》所载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七经纬》八十一篇,当是一致的。

万方数据

律历以定吉凶……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,故智者贵焉,谓之谶书"可知,张衡并不是主张禁绝一切"谶书",而只是要剔除其"后人皮傅"、错谬不经而没有证验的部分(也即所谓"不占之书")。

6.张衡把成、哀之后错谬不经的"不占之书"称为"图谶"(或"图",或"谶"),与先秦时期"圣人明"而"智者贵"、"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"的"谶书",在称呼上似有所区别。因为据他对这两种书的述评看,其褒"谶书"而贬"图谶"之意非常明确。

关于张衡对谶纬的看法,学界有两个基本判断:一是认为张衡说谶纬起源于哀、平之际,二是认为张衡反对谶纬之学。细读张衡的上疏,这两个判断都有理解不周之处。前一点,张衡分明是说:先秦就有"谶书",至成、哀之后复起,哀、平之际"图谶"大成——而这时的"图谶"已与先秦的"谶书"有所不同,出现了不合经、自相矛盾、错谬等问题。后一点,张衡并非反对一切谶说(如不反《河》、《洛》),而只是主张禁绝"成、哀之后"出现的那些"不占之书"。事实上,他是认可天人感应的谶验思想的。如《后汉书》本传载录他给顺帝上疏陈事即有云:"阴阳未和,灾眚屡见,神明幽远,冥鉴在兹。福仁祸淫,景响而应,因德降休,乘失致咎,天道虽远,吉凶可见。"《后汉纪》卷十八载其顺帝阳嘉二年(133)京师地震对策亦云:"政善则休祥降,政恶则咎征见。……昔成王疑周公,而大风拔树木,开金縢而反风至。天人之应,速于影响。故称《诗》曰:'无曰高高在上,日监在兹。'间者京都地震,雷电赫怒。夫动静无常,变改正道,则有奔雷土裂之异。"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"(永兴二年六月)彭城泗水增长逆流"李贤注引张衡对策曰:"水者,五行之首。逆流者,人君之恩不能下及,而致逆也。"这便从思想上决定了张衡不会全面反对谶说。何况,无论从当时人们的知识背景来说,还是从谶纬作为东汉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而言,再进步的思想家(包括桓谭、王充等)都未能主张完全剔除谶纬之学。

张衡的上疏,讲得既明白又含混。其明白之点已如上述;其含混之处在于:第一,他只用了"谶书"、"谶"、"图"、"图谶",而没有使用"纬(书)"这个概念。可是他说到"《河》、《洛》、《六艺》",依照唐人及后世的一般认识,《河》、《洛》属谶,《六艺》属纬。第二,他只是大略讲到先秦"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"、"圣人明"而"智者贵"的"谶书",与成、哀之后"皮傅"的错谬不经、没有征验的"图谶",是不完全相同的,而没有更为具体明确的述说。这两点,对东汉人来说,也许容易明白、无需赘言,但后人就难以理解了。所谓"谶纬",究竟是一是二?先秦"谶书"与西汉"图谶"不尽相同,其同异之纠结演变的情形究竟如何?从张衡的上疏,均得不到明确答案,以致后人持说纷纭。

因此,从历史演变的角度,详细考察两汉谶、纬之分合演变的轨迹,对了解谶纬的起源、性质特征及其复杂变化之情状,实为必须的工作。这个工作,前人已有所涉及。陈槃《论早期谶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》一文[①],即曾简述谶纬的源起、演变云:

> (谶纬)沉淀凝聚约略可分为两重要阶段:盖自战国后期至秦皇世为一阶段。此一阶段之谶纬,虽已由酝酿而始基,然而其书其说,若隐若显。盖其事诡秘,又俗尚尊师重道,故口耳相传,鲜著竹帛。其次两汉三国为一阶段。此一阶段为谶纬极盛时代,风气所趋,用增饰依托,剽窃矫称,假之为干禄取荣之工具,是其特色;于是而纷论无数之卷帙,并出见于此时。吾人今日所见怪奇庞杂之谶纬篇目,即此一阶段之产物也。六朝以来之材料,亦往往而有,然而已属不甚重要。古谶纬之纠结杂糅,层次积累,大抵如此。

陈氏的概述,对谶纬之"极盛时代"以及六朝以后谶纬之价值的评判,均言之有据;惟其将谶纬之"酝酿而始基"阶段上推"战国后期"而止[②],则犹可商榷。实际上,即使根据今天所见之史料,谶验(征验)观念及其行事,至晚在战国前期即已流行。

由于谶纬文献零散错乱、不足以征,本文的考证,只能主要使用谶纬之外的其他史料展开。穷搜

① 陈槃:《论早期谶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》,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本上册,1948年。

② 陈槃《谶纬溯原上》主张谶纬起源于"邹衍及其燕、齐海上之方士"(文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,1944年),所以他把谶纬"始基"上推战国后期为止。

万方数据

先秦两汉典籍及其他相关史料，以期勾勒出两汉谶、纬之分合演变的较为明确的轨迹。

一、谶验观念：自远古至西汉持续存在

就实质而言，谶验观念是初民感性经验的一种总结。它将某种可感的现象（主要是自然现象）与某种社会或人生的结果联系起来，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。因此，“征验”、“纤微”、“秘密”是其重要的思想特征，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色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谶验观念由来已久。刘师培《谶纬论》说：“谶纬之言，起源太古”①，当即是如此理解。两汉谶纬思潮，与先秦谶验观念，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想说清两汉谶纬状貌，须从先秦的谶验观念说起。

“谶”字虽不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，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字书《尔雅》亦不收此字，但是讲述谶验（征验）之事，却普遍存在于先秦典籍中，可知谶验观念于彼时已深入人心。《诗经》中即有很多例证，如《小雅》之《天保》、《斯干》、《无羊》、《十月之交》，《大雅》之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皇矣》、《生民》、《云汉》、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，《周颂》之《昊天有成命》、《敬之》，《商颂》之《玄鸟》等。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等篇，更是集中讲述了天人相感的谶验观念。此外，先秦史、子书中，亦多有此类记述，兹分类略举数例：

> 有星孛入于北斗。周内史叔服曰：“不出七年，宋、齐、晋之君皆将死乱。”②（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）
>
> 二十八年春，无冰。梓慎曰：“今兹宋、郑其饥乎！岁在星纪，而淫于玄枵。以有时灾，阴不堪阳。蛇乘龙，龙，宋、郑之星也。宋、郑必饥。玄枵，虚中也。枵，耗名也。土虚而民耗，不饥何为？”……裨灶曰：“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。岁弃其次，而旅于明年之次，以害鸟、帑，周、楚恶之。”③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）

这是用星象变化配合相应地域以预测未来人事之例。以星象来预测人事，是古老的知识系统。《周礼·春官·保章氏》载：“保章氏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，封域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。”郑玄注说，讲述九州诸国之封域与天星相配的书籍已经亡佚，“今其存可言者，十二次之分也：星纪，吴越也。玄枵，齐也。娵訾，卫也。降娄，鲁也。大梁，赵也。实沉，晋也。鹑首，秦也。鹑火，周也。鹑尾，楚也。寿星，郑也。大火，宋也。析木，燕也。此分野之妖祥，主用客星彗孛之气为象”。

> 夏四月，陈灾。郑裨灶曰：“五年陈将复封，封五十二年而遂亡。”子产问其故。对曰：“陈，水属也；火，水妃（同配）也，而楚所相也。今火出而火陈，逐楚而建陈也④。妃以五成，故曰五年⑤。岁五及鹑火，而后陈卒亡，楚克有之，天之道也，故曰五十二年⑥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）
>
>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，天必先见祥乎下民。黄帝之时，天先见大螾大蝼，黄帝曰“土气胜”，土气胜，故其色尚黄，其事则土。及禹之时，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，禹曰“木气胜”，木气胜，故其色尚青，其事则木。及汤之时，天先见金刃生于水，汤曰“金气胜”，金气胜，故其色尚白，其事则金。及文王之时，天先见火，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，文王曰“火气胜”，火气胜，故其色尚赤，其事则火。

---

① 刘师培：《左盦外集》卷三，《刘申叔遗书》本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影印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本，第1371页。

② 杜预注：“后三年宋弒昭公，五年齐弒懿公，七年晋弒灵公。”

③ 杜预注：“岁星所在，其国有福。失次于北，祸冲在南。南为朱鸟，鸟尾曰帑。鹑火、鹑尾，周、楚之分，故周王、楚子受其咎。俱论岁星过次，梓慎则曰‘宋、郑饥’，裨灶则曰‘周、楚王死’，《传》故备举以示卜占唯人所在。”

④ 杜预注：“水得妃（同配）而兴。陈兴则楚衰，故曰‘逐楚而建陈’。”

⑤ 杜预注：“五行各相妃合，得五而成，故五岁而陈复封。”

⑥ 杜预注：“是岁岁在星纪，五岁及大梁，而陈复封。自大梁四岁而及鹑火，后四周四十八岁，凡五及鹑火，五十二年。天数以五为纪，故五及鹑火，火盛水衰。”按：鲁昭公八年（前534）十一月，楚灵王灭陈。五年后，即昭公十三年（前529），楚平王立吴为陈侯（即陈惠公），陈遂复国。五十二年后，即鲁哀公十七年（前478）（一说鲁哀公十六年秋），楚惠王再灭陈。后来发生的史实与裨灶的预测如合符契。

万方数据

(《吕氏春秋·应同》)

这是用五行征象来预测或判断人事之例。裨灶据鲁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之征象,以及水火相克相配的关系,再联系星象,对陈国未来之国运提出预测。《吕氏春秋》所述,明显是战国阴阳家的"五行相胜"之说。值得注意的是,"大蜮大蝼"、"草木秋冬不杀"、"金刃生于水"、"火,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"这些"天先见"的自然征象,是黄帝、禹、汤、周文王判断各自运命(土、木、金、火)的依据,进而也成为他们各自行事的依据。

初,懿氏卜妻敬仲(陈完)。其妻占之曰:"吉。是谓'凤凰于飞,和鸣锵锵。有妫(陈之国姓)之后,将育于姜(齐之国姓)。五世其昌,并于正卿。八世之后,莫之与京'。"……及陈之初亡也,陈桓子(即陈无宇,陈完的五世孙)始大于齐;其后亡也,成子(即陈常,陈完的八世孙)得政。(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)

初,毕万筮仕于晋,遇《屯》(震下坎上)之《比》(坤下坎上)。辛廖占之,曰:"吉。《屯》固、《比》入,吉孰大焉?其必蕃昌。震为土(指震变为坤),车从马(震为车,坤为马),足居之(震为足),兄长之(震为长男),母覆之(坤为母),众归之(坤为众),六体不易,合而能固,安而能杀,公侯之卦也。公侯之子孙(毕万为毕公高之后),必复其始。"(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)

(史墨)曰:"……昔成季友,桓之季也,文姜之爱子也。始震(妊娠)而卜,卜人谒之,曰:'生有嘉闻,其名曰友,为公室辅。'及生,如卜人之言,有文在其手曰'友',遂以名之。既而有大功于鲁,受费以为上卿。至于文子、武子,世增其业,不废旧绩。鲁文公薨,而东门遂杀适立庶,鲁君于是乎失国,政在季氏,于此君也四公矣。……"(《左传·昭公三十二年》)

这是以占卜预测未来人事之例。朱熹曾云:"陈敬仲、毕万、季友占筮,皆如后世符命之类。"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八考证》引)清人张尚瑗《左传折诸》卷三"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"条也说:"此传(按:指上列第一条)与史墨论陈亡,皆田氏代齐之符命也;毕万筮仕于晋,魏氏分晋之符命也;季友有文在手,季氏专鲁之符命也。《左氏书》成于战国之初,故于齐、晋、鲁三国谋篡之臣,皆详其谶纬[①]。"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)《左传》这类占验故事很多,都是以神秘的"征验"为其基本特征,概属谶类无疑。《左传》中的《易》占故事(如上举第二例),与其他占验故事没有什么区别,都可以划入谶的范畴。

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,嬖人婴姶生孟縶。孔成子(卫国大夫,名烝鉏)梦康叔(卫国之始封祖)谓己:"立元(元,孟縶弟。此时元尚未出生),余使羁(孔成子之子)之孙圉与史苟(史朝之子)相之。"史朝亦梦康叔谓己:"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。"史朝见成子,告之梦,梦协。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,婴姶生子,名之曰元。……孔成子以《周易》筮之,曰:"元尚享卫国,主其社稷。"……史朝曰:"……康叔命之,二卦告之,筮袭于梦(谓筮与梦相合)……"故孔成子立灵公(即元)。(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)

虢公梦在庙,有神人面白毛虎爪,执钺立于西阿之下。公惧而走。神曰:"无走!帝命曰:'使晋袭于尔门。'"公拜稽首。觉,召史嚚占之,对曰:"如君之言,则蓐收也[②],天之刑神也,天事官成[③]。"公使囚之,且使国人贺梦[④]。舟之侨告其诸族曰:"众谓虢亡不久,吾乃今知之。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袭,于己何瘳?吾闻之曰:'大国道,小国袭焉,曰服。小国敖(通"傲"),大国袭焉,曰诛。'民疾君之侈也,是以遂于逆命。今嘉其梦,侈必展,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。民疾其态,天又

① 符命属谶类。并且,所谓"纬"必当在"经"之后,故汉代以前之谶不可称为"谶纬"。张尚瑗此谓"谶纬",是不准确的。

② 韦昭注:"蓐收,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。"徐元诰《集解》引《礼记·月令》孔疏"蓐收者,言秋时万物摧辱而收敛",云:"蓐收为肃杀之义,因以名神。"

③ 韦昭注:"官成,祸福各以官象成也。"徐元诰《集解》:"成,疑当为戒字之误。官,主也。天事官成,谓天事主戒也,所以风虢公也。"

④ 韦昭注:"欲转吉之,故使贺也。"

万方数据

谁之，大国来诛，出令而逆，宗国既卑，诸侯远己，内外无亲，其谁云救之？吾不忍俟也！将行。”以其族适晋。六年，虢乃亡。（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）

这是以梦境预断或预告人事之例。孔烝鉏等立元为国君（卫灵公），决定于事前的梦境；虢国之被晋所灭，事先也得到神人托梦预告。这类谶验，可谓之“梦谶”。

先秦典籍中以征象预测断事的其他类型的例证还有很多，兹略举几例：

四年春王三月，楚武王荆尸，授师子焉，以伐随。将齐（通“斋”），入告夫人邓曼曰：“余心荡。”邓曼叹曰：“王禄尽矣。盈而荡，天之道也。先君其知之矣，故临武事，将发大命，而荡王心焉。若师徒无亏，王薨于行，国之福也。”[①]王遂行，卒于樠木之下。（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）

献公问于卜偃曰：“攻虢，何月也？”对曰：“童谣有之，曰：‘丙之晨，龙尾伏辰[②]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旗。鹑之贲贲，天策焞焞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’[③]火中而旦，其九月、十月之交乎？”（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）

宋康王之时，有雀生鹯于城之陬。使史占之，曰：“小而生巨，必霸天下。”康王大喜。于是灭滕伐薛，取淮北之地。……（《战国策·宋策》）

昔者三苗大乱，天命殛之。有妖宵出，雨血三朝，龙生于庙，犬哭乎市，夏冰，地坼及泉，五谷变化。民乃大振（同震）。高阳乃命[禹于]玄宫，禹亲把天之瑞令，以征有苗。……沓（通“逮”。下同）至乎夏王桀，天有酷命。日月不时，寒暑杂至，五谷焦死，鬼呼[于]国，鹤鸣十夕余。天乃命汤于镳宫，用受夏之大命。……沓至乎商王纣，天不序其德，祀用失时，兼夜中（按：此处有脱文），十日雨土于薄，九鼎迁止，妇妖宵出，有鬼宵吟，有女为男，天雨肉，棘生乎国道。王兄（读为况）自纵也。赤鸟衔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：“天命周文王，伐殷有国。”泰颠来宾，河出《绿图》，地出乘黄。武王践功（孙诒让云：疑为践阼），梦见三神，曰：“予既沉渍殷纣于酒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（读为‘戡’）之。”武王乃攻狂夫（孙诒让云：攻狂夫，疑当为往攻之）。反商之周，天赐武王黄鸟之旗。……（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）

《左传》邓曼以楚武王“心荡”之象预断他出师伐随将会不利，《国语》卜偃引述童谣预示伐虢的时间和结果，此二者都是事先根据某种征象预测未来之结果。《战国策》所载宋康王之灭滕伐薛，《墨子》所载之禹征三苗、商汤灭夏、武王灭商，事前均有某些征象，而成为宋康王、夏禹、商汤、文武王之征伐决断的根据。这些史料，都鲜明地体现着征验（征测）的思想特征，概属谶之范畴。此外，如《管子》之《幼官》、《四时》、《五行》等篇，《吕氏春秋》之十二纪，也有不少此类例证，不赘述。

有一个问题需要简单辨明：《左传》记载史事预测的言论，有不少与后来发生的史实十分吻合，不免令人生疑。对于此种现象的一个合理推测是：这些预测言论，乃是得见事情发生的后人敷衍进去的。这也成为后世质疑《左传》真伪的证据。《左传》之真伪（或有真有伪），是个复杂问题，此处不拟纠缠。对本论题而言，有两点需要说明：第一，《左传》的史事预测，并非完全符合后来的史实。文渊阁《四库全书总目·〈春秋左传正义〉提要》就说：“《左传》载预断祸福，无不征验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。惟哀公九年称‘赵氏其世有乱’，后竟不然，是未见后事之证也。”其实《左传》所载预测不验之事，不止此一件。卫聚贤《古史研究·〈左传〉的研究》指出：“卜辞言‘季氏亡则鲁不昌’（按见闵公二年），事不应，是著者未及见鲁季氏亡。言齐田‘五世其昌，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’，不言其十世为侯，是未及见周安王十六年田和之为侯。又谓‘成王定鼎于郟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’（按见宣公三年），三十世为安

① 杜预注：“楚为小国，僻陋在夷，至此武王始起其众，僭号称王。陈兵授师，志意盈满，临齐（通“斋”）而散。故邓曼以天地鬼神为征应之符。”

② 韦昭注：“龙尾，尾星也。伏，隐也。辰，日月之交会也。谓鲁僖五年冬、周十二月、夏十月丙子朔之朝，日在尾，月在天策。伏辰，辰在龙尾，隐而未见。”

③ 韦昭注：“鹑，鹑火，鸟星也。贲贲，鹑貌也。天策，尾上一星名曰天策，一名傅说。焞焞，近日月之貌也。火，鹑火也。中，晨中也。成军，军有成功也。传曰：‘冬十二月丙子朔，晋灭虢，虢公丑奔京师。’”

万方数据

王,七百年为安王三年。但安王后尚有四世一百五十三年,若在安王三年时周尚未亡,著者何能如此云云。又言魏子'其长有后于晋国乎'(按见襄公二十八年),如见魏斯为侯,则应说'其长有后于魏',是著者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斯为侯以前之人,而威烈王元年以后之人。"[①]预测之有应验、有未应验,恰可说明《左传》成书时间不会很靠后。第二,关于《左传》成书的年代,近代以来颇有疑为刘歆伪造者,那往往是为今文经学张目,不足为信。崔述《洙泗考信录·余录》从文风来判断其时代,最为切理厌心,因为文风是难以伪饰的:"战国之文姿横,而《左传》文平易简直,颇近《论语》及《戴记》之《曲礼》、《檀弓》诸篇,绝不类战国时文,何况于秦?襄、昭之际,文词繁芜,远过文、宣以前,而定、哀间反略,率多有事无词,哀公之末事亦不备,此必定、哀之时,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,故尔。然则作书之时,上距定、哀未远,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。"[②]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经过翔实论证后,得出结论:"《左传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,周安王十三年(公元前389年)以前。"[③]也就是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。沈玉成《春秋左传学史稿》也说:"自康有为以来倡言《左传》为刘歆伪作之说,可以断然排除。……这部书从草创到写定,应该经历一个过程,具体说,当是草创于春秋末而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,由授受者不断补充润色,大体定型。"[④]因此,尽管《左传》所载预测史事之事,是事发之后敷衍进去的,但无论如何,它们都是战国中期之前的史料,代表着先秦人的思想观念。《国语》的情况,亦是如此。

由以上例举可见,作为汉代谶纬主体内容的天文占、五行占、史事谶,以及其他种种谶验,在先秦时期几乎都已存在。只不过,迄今尚未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把这类事项称作"谶"的史料,可谓有其实而无其名。

从现存史料看,最早以"谶"称呼先秦征验之事的,是《史记·赵世家》:

> 赵简子疾,五日不知人,大夫皆惧。医扁鹊视之,出,董安于问。扁鹊曰:"血脉治也,而何怪!在昔秦缪公尝如此,七日而寤。寤之日,告公孙支与子舆曰:'我之帝所甚乐。吾所以久者,适有学也。帝告我:"晋国将大乱,五世不安;其后将霸,未老而死;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。"'公孙支书而藏之,秦谶于是出矣。献公之乱,文公之霸,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,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疾与之同,不出三日疾必间,间必有言也。"
>
> 居二日半,简子寤。语大夫曰:"我之帝所甚乐,与百神游于钧天,广乐九奏万舞,不类三代之乐,其声动人心。有一熊欲来援我,帝命我射之,中熊,熊死。又有一罴来,我又射之,中罴,罴死。帝甚喜,赐我二笥,皆有副。吾见儿在帝侧,帝属我一翟犬,曰:'及而子之壮也,以赐之。'帝告我:'晋国且世衰,七世而亡,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,而亦不能有也。今余思虞舜之勋,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。'"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。

秦缪公病见天帝得告"晋国将大乱,五世不安……",赵简子病见天帝得告"晋国且世衰,七世而亡……",其性质与上举诸例没有任何区别,而《史记》称之为"谶"。

陈槃《谶纬溯原上》将谶纬之源头上溯到"邹衍及其燕、齐海上之方士"为止,断言"邹衍以前,无所谓谶","谶纬中所载迷信之说,前古多有之。然前古虽亦有此迷信,不可谓此即谶纬也"。其论邹衍之学与谶纬的密切关系堪称翔实有据,而断言邹衍之前无谶,则甚为武断寡证。邹衍之前(乃至邹衍前后)固然无纬,然则亦无谶乎?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所载春秋时征验之事(如上文所举例),与汉世之谶说,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它们固然是后人所敷衍,但毕竟是战国前期的史料(《史记·赵世家》所载,恐亦非史迁妄造,必当有先秦史料依据),而邹衍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(与燕昭王同

---

① 转引自张心澄:《伪书通考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54年,第394页。按:此为张心澄综录卫聚贤之说。卫氏《古史研究》第二编《〈左传〉的研究》(上海:新月书店,1928年)中,原文见于前后多处考证文段。为便利醒目,此处转引张氏综录。

② 崔述:《洙泗考信录》,《丛书集成新编》第6册,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4年影印本。

③ 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1年,第41页。

④ 沈玉成:《春秋左传学史稿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第82页。

万方数据

时),已是战国后期。然则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之记载怎能简单否弃?何以只能称作"迷信"而"不可谓谶"?陈槃力主谶纬是一非二,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那些史料当然不能称为"纬"(事实上汉人亦未称之为"纬",而均称之为"谶"),为了维护其"谶纬一也"的基本观点,他必然会说"不可谓谶"了。但遗憾的是,陈槃于此关键之点,并无任何论证,唯有断言而已[①]。

通行的说法,是谶纬始自西汉哀、平之际。此种认识,不仅曲解了张衡(见上述),也与西汉的思想发展实际不符。事实是,自西汉初起,谶验观念便一直存在。并且,据今天可见史料,"谶"字最早即出于汉初贾谊的《鹏鸟赋》:

> 异物来崒,私怪其故。发书占之,谶言其度,曰"野鸟入室,主人将去"。

这个"谶"字,明显是指谶书;其内容也很清楚,就是征验(根据某种征象而预测未来吉凶)之类[②]。这里有两点尤须注意:第一,既言"发书占之,谶言其度",又引述了具体内容,则贾谊时已有成型的"谶书"[③];第二,根据贾赋的语气,说谶书、用"谶"字平易自如,脱口而出,由此似也可以推测,在汉初的语言实践中,用"谶"字、言谶事当不为新僻。"野鸟入室,主人将去"之谶语,文献记载似亦首见于此赋。但既是贾谊所见之谶书所载,则当是汉初之前即已流传[④]。

实际上,贾谊之前的秦汉之际,延续先秦谶验观念,于史籍中亦不乏见。例如:

> 三十二年(前215)……始皇巡北边,从上郡入。燕人卢生使入海还,以鬼神事,因奏《录图书》,曰"亡秦者胡也"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。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
>
> (陈胜吴广)乃行卜。卜者知其指意,曰:"足下事皆成,有功。然足下卜之鬼乎[⑤]!"陈胜、吴广喜,念鬼,曰:"此教我先威众耳。"乃丹书帛曰"陈胜王",置人所罾鱼腹中。卒买鱼烹食,得鱼腹中书,固以怪之矣。又间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,夜篝火,狐鸣呼曰:"大楚兴,陈胜王。"卒皆夜惊恐。旦日,卒中往往语,皆指目陈胜。(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)
>
> (高祖)拔剑击斩蛇。……后人来至蛇所,有一老妪夜哭。人问何哭,妪曰:"人杀吾子,故哭之。"人曰:"妪子何为见杀?"妪曰:"吾子,白帝子也,化为蛇,当道,今为赤帝子斩之,故哭。"人乃以妪为不诚,欲笞之,妪因忽不见。……后人告高祖,高祖乃心独喜,自负。诸从者日益畏之。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)

《秦始皇本纪》所说卢生上奏之《录图书》,就是谶书《河图》[⑥];秦始皇笃信"亡秦者胡"这句谶语,才会发兵击胡。陈胜、吴广假造丹书谶言"陈胜王",号召起义得成,时人深信谶验之事,无疑是一个重要

---

① 陈槃另有长文《秦汉间之所谓"符应"论略》(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六本,1948年),征引宏富史料,论说符应与谶纬之关系。其基本观点是:符应之说出自上古史官,邹衍书因袭增益于上古之符应说,秦汉间符应说出自邹衍,而谶纬则出自秦汉符应说之结集。同时强调,符应说经过方士的增益,"其范围固已扩充至符应思想以外,而自成一组织",意在说明谶纬与符应之不同。此一论断的问题在于,如果谶纬与先秦符应仅仅是数量或范围上有多寡(或谓因于新时代之形势和需要而有所增益),而没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,则很难说二者是不同的东西。陈氏自己也说:"谶纬出自邹(衍)书,而邹书(对上古史官符应之说)盖亦多所采袭,匪由冯空虚构","盖(秦汉)此类符应说之结集,实为谶纬之基本材料"。然则,先秦之符应,亦"不可谓谶"乎?

② 《汉书》卷四十八《贾谊传》颜师古注:"谶,验也,有征验之书也。"

③ 张衡《请禁绝图谶疏》也把"或观星辰逆顺,寒燠所由,或察龟策之占,巫觋之言……立言于前,有征于后"的先秦古书称为"谶书"。可以互证。

④ 《西京杂记》卷五载有"长沙俗以鹏鸟至人家,主人死"之语(刘歆撰,葛洪集,向新阳、刘克任校注:《西京杂记校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248页)。定型的俗世观念,往往历史悠久并能流传广远。

⑤ 裴骃《集解》引苏林曰:"狐鸣祠中则是也。"又引瓒曰:"假托鬼神以威众也。"

⑥ 王充《论衡·实知》:"'亡秦者胡','《河图》之文也。"又,贾谊《新书·修政语上》:"(黄帝)济东海,入江内,取《绿图》,西济积石,涉流沙,登于昆仑。于是,还归中国,以平天下。"《初学记》卷六《地部中·河》引《河图》:"黄帝乃斋河、洛之间,求象见者。至于翠妫泉,大卢鱼折溜而至。……鱼泛白图,蓝菜(按"菜",疑当为"采")朱文,以授黄帝。舒视之,名曰《录图》。"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一《帝王部一·黄帝轩辕氏》引《河图挺佐辅》:"黄帝乃祓斋七日,至于翠妫之川,大鲈鱼折溜而至,乃与天老迎之,五色毕具,鱼泛白图,蓝叶朱文,以授黄帝,名曰《录图》。"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十九《皇王部四·黄帝轩辕氏》引《河图挺佐辅》:"黄帝乃祓斋七日……至于翠妫之渊,大卢鱼泝流而至。……独与天老跪而迎之。五色毕具,天老以授黄帝。黄帝舒视之,名曰《录图》。"可知《绿图》、《录图》即《河图》。

万方数据

原因。刘邦斩白蛇起兵灭秦，虽无谶语出现，但“赤帝子”斩杀“白帝子”之征象，即是“符命”[①]，与上举二事都基于同样的社会思想观念。

至西汉时期，谶验繁多。只要翻检一下《汉书》之十二帝纪及其《五行志》、《天文志》、《郊祀志》等，即不难看到：自高祖至平帝，谶验之事无朝无之。其间一个明显变化，是从武帝朝开始，谶验灾祥之类记载显著增多，帝王之天人感应思想更加浓厚鲜明；至成、哀、平（包括王莽）时期，谶事大盛。为免烦琐，以下仅举西汉十二帝各一条谶记以证：

（高祖）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[②]。沛公至霸上。……（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）

按：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未记此事，然其《张耳陈余列传》载：“张耳败走……甘公曰：‘汉王之入关，五星聚东井。东井者，秦分也。先至必霸。楚虽强，后必属汉。’故耳走汉。”又，《汉书·天文志》：“汉元年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，以历推之，从岁星也。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。故客谓张耳曰：‘东井秦地，汉王入秦，五星从岁星聚，当以义取天下。’秦王子婴降于枳道，汉王以属吏，宝器妇女亡所取，闭宫封门，还军次于霸上，以候诸侯。与秦民约法三章，民亡不归心者，可谓能行义矣，天之所予也。五年遂定天下，即帝位。”

（惠帝四年三月）宜阳雨血。秋七月乙亥，未央宫凌室灾；丙子，织室灾。（《汉书·惠帝纪》）

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中之下》：“惠帝二年（按《惠帝纪》作“四年”），天雨血于宜阳，一顷所，刘向以为赤眚也。……是时，政舒缓，诸吕用事，谗口妄行，杀三皇子，建立非嗣，及不当立之王，退王陵、赵尧、周昌。吕太后崩，大臣共诛灭诸吕，僵尸流血。京房《易传》曰：‘归狱不解，兹谓追非，厥咎天雨血；兹谓不亲，民有怨心，不出三年，无其宗人。’又曰：‘佞人禄，功臣僇，天雨血。’”又，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：“惠帝四年十月（按《惠帝纪》作“七月”）乙亥，未央宫凌室灾；丙子，织室灾。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，残戮其母戚夫人。是岁十月壬寅，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。其乙亥，凌室灾。明日，织室灾。凌室所以供养饮食，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，与春秋御廪同义[③]。天戒若曰：‘皇后亡奉宗庙之德，将绝祭祀。’其后，皇后亡子，后宫美人有男，太后使皇后名之，而杀其母。惠帝崩，嗣子立，有怨言。太后废之，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。赖大臣共诛诸吕而立文帝，惠后幽废。”

（高后元年）夏五月丙申，赵王宫丛台灾。（《汉书·高后纪》）

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：“高后元年五月丙申，赵丛台灾。刘向以为：是时吕氏女为赵王后，嫉妒，将为谗口以害赵王。王不寤焉，卒见幽杀。”

（文帝十六年）秋九月，得玉杯，刻曰“人主延寿”。令天下大酺，明年改元。（《汉书·文帝纪》）

按：新垣平以谶术欺诈文帝之事，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所载较详：“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，言：‘长安东北有神气，成五采，若人冠冕焉。或曰东北，神明之舍；西方，神明之墓也。天瑞下，宜立祠上帝，以合符应。’于是作渭阳五帝庙。……明年夏四月，文帝亲拜霸渭之会，以郊见渭阳五帝。……文帝出长门，若见五人于道北，遂因其直立五帝坛。……其明年，平使人持玉杯，上书阙下献之。平言上曰：‘阙下有宝玉气来者。’已视之，果有献玉杯者，刻曰‘人主延寿’。平又言：‘臣候，日再中。’居顷之，日却复中。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，令天下大酺。”

（文帝后元七年）九月（按景帝已于本年六月即位），有星孛于西方。（《汉书·景帝纪》）

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：“文帝后七年九月，有星孛于西方，其本直尾、箕，末指虚、危，长丈

① 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裴骃《集解》引应劭曰：“秦襄公自以居西戎，主少昊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。至献公时，栎阳雨金，以为瑞，又作畦畤，祠白帝。少昊，金德也。赤帝，尧后，谓汉也。杀之者，明汉当灭秦也。”《汉书·高帝纪赞》：“断蛇著符，旗帜上赤，协于火德，自然之应，得天统矣。”

②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：“东井，秦之分野。五星所在，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。”

③ 《左传·桓公十四年》：“秋八月壬申，御廪灾。”杜预注：“御廪，公所亲耕以奉粢盛之仓也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引《穀梁传》曰：“天子亲耕，以共粢盛；王后亲蚕，以共祭服。国非无良农、工女也，以为人之所尽事其祖祢，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。”

万方数据

余，及天汉，十六日不见。刘向以为：尾，宋地，今楚彭城也。箕为燕，又为吴、越、齐。宿在汉中，负海之国水泽地也。是时景帝新立，信用晁错，将诛正诸侯王，其象先见。后三年，吴、楚、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，皆诛灭云。”又，《汉书·天文志》：“孝景元年正月癸酉，金、水合于婺女。占曰：‘为变谋，为兵忧。婺女，粤也，又为齐。’其七月乙丑，金、木、水三合于张。占曰：‘外内有兵与丧，改立王公。张，周地，今之河南也，又为楚。’其二年七月丙子，火与水晨出东方，因守斗。占曰：‘其国绝祀。’至其十二月，水、火合于斗。占曰：‘为淬，不可举事用兵，必受其殃。’一曰：‘为北军，用兵举事大败。斗，吴也，又为粤。’是岁，彗星出西南（按《景帝纪》作“二年冬十二月，有星孛于西南”）。其三月，立六皇子为王，王淮阳、汝南、河间、临江、长沙、广川。其三年，吴、楚、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赵七国反。吴、楚兵先至攻梁，胶西、胶东、淄川三国攻围齐。汉遣大将军周亚夫等戍止河南，以候吴、楚之敝，遂败之。吴王亡走粤，粤攻而杀之。平阳侯败三国之师于齐，咸伏其辜，齐王自杀。”

（武帝元光元年）秋七月癸未，日有蚀之。……（元狩元年）五月乙巳晦，日有蚀之。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

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：“（元光元年）七月癸未，先晦一日，日有食之，在翼八度。刘向以为：前年高园便殿灾，与春秋御廪灾后日食于翼、轸同。其占：内有女变，外为诸侯。其后陈皇后废，江都、淮南、衡山王谋反，诛。”又载：“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，日有食之，在柳六度。京房《易传》推以为：是时日食从旁右，法曰‘君失臣’。明年，丞相公孙弘薨。日食从旁左者，亦君失臣；从上者，臣失君；从下者，君失民。”

（昭帝元凤）三年春正月，泰山有大石自起立，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。（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）

按：此事引发了西汉一场政治地震。《汉书·眭弘传》记载甚详：“孝昭元凤三年正月，泰山、莱芜山南，匈匈有数千人声，民视之，有大石自立，高丈五尺，大四十八围，入地深八尺，三石为足。石立后，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。是时，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。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，亦自立生，有虫食树叶成文字，曰‘公孙病已立’。孟推《春秋》之意，以为‘石、柳皆阴类，下民之象；而泰山者，岱宗之岳，王者易姓告代之处。今大石自立，僵柳复起，非人力所为，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。枯社木复生，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。’孟意亦不知其所在，即说曰：‘先师董仲舒有言，虽有继体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受命。汉家尧后，有传国之运。汉帝宜谁差天下，求索贤人，禅以帝位，而退自封百里，如殷、周二王后，以承顺天命。’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。时昭帝幼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恶之，下其书廷尉。奏赐、孟妄设祆言惑众，大逆不道，皆伏诛。后五年，孝宣帝兴于民间，即位，征孟子为郎。”又，《汉书·五行志中之下》亦载：“昭帝时，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，一朝起立，生枝叶。有虫食其叶，成文字，曰‘公孙病已立’。又，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。眭孟以为，木阴类，下民象，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。昭帝富于春秋，霍光秉政，以孟妖言，诛之。后昭帝崩，无子，征昌邑王贺嗣位，狂乱失道，光废之，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，是为宣帝。宣帝本名病已。京房《易传》曰：‘枯杨生稊，枯木复生，人君亡子。’”

（宣帝）地节元年春正月，有星孛于西方。……十二月癸亥晦，日有蚀之。（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）

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：“宣帝地节元年正月，有星孛于西方，去太白二丈所。刘向以为：太白为大将，彗孛加之，扫灭象也。明年，大将军霍光薨，后二年，家夷灭。”又，《汉书·天文志》：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，月食荧惑，荧惑在角、亢。占曰：‘忧在宫中，非贼而盗也。有内乱，谗臣在旁。’其辛酉，荧惑入氐中。氐，天子之宫，荧惑入之，有贼臣。其六月戊戌甲夜，客星又居左右角间，东南指，长可二尺，色白。占曰：‘有奸人在宫廷间。’其丙寅，又有客星见贯索东北，南行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，芒炎东南指，其色白。占曰：‘有戮卿。’一曰：‘有戮王。期皆一年，远二年。’是时，楚王延寿谋逆自杀。四年，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、将军霍禹、范明友、奉车霍山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、诸曹、九卿、郡守皆谋反，咸伏其辜。”

万方数据

（元帝初元三年）夏四月乙未晦，茂陵白鹤馆灾。诏曰："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，朕战栗恐惧。不烛变异，咎在朕躬。……其赦天下。"（《汉书·元帝纪》）

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："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，孝武园白鹤馆灾。刘向以为：先是，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辅政，为佞臣石显、许章等所谮，望之自杀，堪废黜。明年，白鹤馆灾。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，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。天戒若曰：'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，将害忠良。'后，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，免官。"又，《汉书·翼奉传》："……夏四月乙未，孝武园白鹤馆灾。奉自以为中，上疏曰：'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，曰极阴生阳，恐有火灾[①]。……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，时加于卯，月宿亢灾，与前地震同法。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。……'"

（成帝永始二年）二月癸未夜，星陨如雨。乙酉晦，日有蚀之。诏曰："……天著变异，以显朕邮（通"尤"），朕甚惧焉。公卿申敕百寮，深思天诫……"（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）

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："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，夜过中，星陨如雨，长一二丈，绎绎未至地灭，至鸡鸣止。谷永对曰：'日月星辰，烛临下土，其有食陨之异，则遐迩幽隐靡不咸睹。星辰附离于天，犹庶民附离王者也。王者失道，纲纪废顿，下将叛去，故星叛天而陨，以见其象。《春秋》记异，星陨最大，自鲁严（即鲁庄公，庄公七年四月"星陨如雨"）以来，至今再见。臣闻三代所以丧亡者，皆繇妇人群小，湛湎于酒。《书》云："乃用其妇人之言，四方之逋逃多罪，是信是使。"（见《尚书·泰誓》）《诗》曰："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"（见《小雅·正月》），"颠覆厥德，荒沈于酒"（见《大雅·抑》）。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，养生大奢，奉终大厚。方今国家兼而有之，社稷宗庙之大忧也。'京房《易传》曰：'君不任贤，厥妖天雨星。'"又载："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，日有食之。谷永以京房《易占》对曰：'今年二月日食，赋敛不得度，民愁怨之所致也。所以使四方皆见、京师阴蔽者，若曰：人君好治宫室，大营坟墓，赋敛兹重，而百姓屈竭，祸在外也。'"

（哀帝建平二年六月）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[②]，汉家历运中衰，当再受命，宜改元易号。诏曰："汉兴二百载，历数开元。皇天降非材之佑，汉国再获受命之符，朕之不德，曷敢不通！夫基事之元命，必与天下自新，其大赦天下。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，号曰'陈圣刘太平皇帝'，漏刻以百二十为度[③]。"……八月，诏曰："……朕过听贺良等言，冀为海内获福，卒亡嘉应。皆违经背古，不合时宜。六月甲子制书，非赦令也，皆蠲除之。贺良等反道惑众，下有司。"皆伏辜。（《汉书·哀帝纪》）

按：此事引发了西汉又一场政治地震，《汉书·李寻传》记载甚详。成帝时，齐人甘忠可诈造《天官历》、《包元太平经》，以言"汉家逢天地之大终，当更受命于天"。哀帝初立，夏贺良、解光、李寻等再陈"汉历中衰，当更受命"，于是有改元易号等等之事。又，《汉书·天文志》亦载："（建平）二年二月，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。传曰：'彗，所以除旧布新也。牵牛，日、月、五星所从起，历数之元，三正之始。彗而出之，改更之象也。其出久者，为其事大也。'其六月甲子，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，增漏刻。……八月丁巳，悉复蠲除之，贺良及党与皆伏诛流放。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。"

（平帝元始元年）六月，长安女子有生儿，两头异颈面相乡（通"向"。下文同），四臂共匈俱前乡，尻上有目长二寸所。（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上》）

---

① 按：去年，翼奉上疏有云："臣又闻未央、建章、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，皆不得天性。若杜陵园，其已御见者，臣子不敢有言……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，宜为设员，出其过制者。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。今异至不应，灾将随之。其法大水，极阴生阳，反为大旱，甚则有火灾……"。

②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："高祖感赤龙而生，自谓赤帝之精。良等因是作此谶文。"《汉书·王莽传上》："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，更为太初元将元年。案其本事，甘忠可、夏贺良谶书臧兰台。"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之《前汉书卷十一考证》："臣（齐）召南按：'谶'字始见于此（按：此说误。贾谊《鹏鸟赋》、《史记·赵世家》均已有"谶"字）。高祖以斩白蛇，旗帜上赤。然张苍谓汉本水德，公孙臣非之。至武帝时，犹谓以土德王，未有言火德者也。赤精子之说，亦起于此。"

③ 颜师古注："旧漏昼夜共百刻，今增其二十。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，今贺良等重言，遂施行之。"

万方数据

按: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上》:"京房《易传》曰:'"睽孤,见豕负涂"(《易·睽卦》上九爻辞),厥妖人生两头。下相攘善,妖亦同。人若六畜首目在下,兹谓亡上,正将变更。凡妖之作,以谴失正,各象其类。二首,下不壹也;足多,所任邪也;足少,下不胜任,或不任下也。凡下体生于上,不敬也;上体生于下,媟渎也。生非其类,淫乱也。人生而大,上速成也;生而能言,好虚也。群妖推此类,不改乃成凶也。'"

以上例举西汉十二帝谶验之记载及其时学人的阐释,足以证明:整个西汉时期,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,始终存续着先秦以来的谶验观念,从未断绝。历来通行的"谶纬起于哀、平"之说,其实并不确切,可不攻自破矣。

至王莽,迷信图谶,以图谶符命摄政、即真以及行政、拜官加爵种种可笑之事,其"班《符命》四十二篇于天下",《汉书·王莽传》记载甚详。再到刘秀乃至整个东汉时期,图谶盛行,自不待言。

总上所述,谶验观念自远古直至汉末一直存在,始终不曾断绝。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。

西汉文帝二年(前178)十一月日食之后的诏书,值得特别提出:

> 朕闻之:天生民,为之置君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德,布政不均,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。乃十一月晦,日有食之,适(读为"谪")见于天,灾孰大焉!朕获保宗庙,以微眇之身,托于士民君王之上,天下治乱,在予一人,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治育群生,上以累三光之明,其不德大矣。令至,其悉思朕之过失,及知见之所不及,匄以启告朕。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,以匡朕之不逮。因各敕以职任,务省繇赋以便民。朕既不能远德,故惆然念外人之有非,是以设备未息。今纵不能罢边屯戍,又饬兵厚卫,其罢卫将军军。太仆见马遗财足,余皆以给传置。(《汉书·文帝纪》)

文帝此诏,显然已经充满天人感应的谶验思想,极可重视:第一,它是汉代把灾异与政治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的第一个诏书,并且早于董仲舒的思想活动(董仲舒景帝时始为博士,其思想真正产生影响又是在武帝时);第二,此诏书中天人(君)相感应之基本思想、对待灾异之敬惧态度和果断采取相应措施之行政策略,甚至诏书之行文结构,都是发凡创例,成为其后汉帝同类诏书和行政取向的范本;第三,此诏书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其后学者的思想取向,显例如董仲舒、刘向,他们对春秋的"日食三十六",几乎是逐一作出解释,无一例外地都把日食天象与弑君、灭国、兵戎等社会政治事件联系起来,认为二者有相互感应关系。对西汉的部分日食,刘向、谷永等也有同类的推阐、解说,而京房的《易传》,往往被当做他们的理论依据(参见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下》)。西汉中后期学者的此类谶验思想,无疑曾得到过这位后世倍加景仰的圣明帝王的指引和鼓舞。

二、"纬书"之"纬":东汉后期始见,而有名无实

明确了先秦至汉末始终存在"谶"思想,再来看"纬"的情况。首先一个事实是,自明人孙瑴《古微书》至今的谶纬辑佚书,无论其称《纬书》、《集纬》、《七纬》、《通纬》、《纬攟》,还是《纬书集成》,其实际内容都不过是"谶"书之残存而已;倒是孙瑴称之为"微书",最为切合实际。古今许多学人,正是把此种情形当作谶、纬无别的重要证据之一。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,所以如此,是因为所谓"纬书"根本就不存在,"纬书"实即"谶书"(以谶"纬"经之书);以"纬"称之,是后汉图谶学者企图将图谶与"经"相并列,自我高尚而已(详下)。因此,这里考察先秦两汉"纬"的情实,只能从其字义、字用的角度进行。

先把存世的唐前字书对"纬"字的释义,集中于下:

> 《说文解字·系部》:"经,织从丝也";"纬,织衡丝也。"
>
> 《释名·释典艺》:"经,径也,常典也,如径路无所不通,可常用也。纬,围也,反覆围绕以成经也。"
>
> 《广雅·释言》:"纬,横也。"
>
> 《玉篇·糸部》:"纬,横织丝。经,常也。经、纬以成缯帛也。"

万方数据

“纬”字亦不见于《尔雅》。由以上释义可以显见:“纬”字的含义,从来都是与“经”相配的,本义是“织物的横线”。延伸到指谓书籍这个含义,“纬”也是指与“经”直接相关、阐释“经”的书(《释名》所谓“反覆围绕以成经”),并没有“谶”字所包含的“征验”、“纤微”、“秘密”一类意思。

再看“纬”字在西汉(含)以前实际的使用情况。还是先把这个时期传世典籍中有“纬”字的史料集中于下:

《周礼·冬官考工记·匠人》:“国中九经九纬,经涂九轨。”①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四年》:“嫠不恤其纬。”②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:“礼,上下之纪,天地之经纬也。”

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:“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,以经纬其民,卿大夫以序守之,民是以能尊其贵,贵是以能守其业。”

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“比于文王”《毛传》:“经纬天地曰文。”(以上经部)

《国语·周语下》:“天六地五③,数之常也。经之以天,纬之以地。经纬不爽,文之象也。”

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:“经纬天地曰文。道德博厚曰文。学勤好问曰文……”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《之罘刻石》:“周定四极,普施明法。经纬天下,永为仪则。”

《史记·礼书》:“观三代损益,乃知缘人情而制礼,依人性而作仪,其所由来尚矣。人道经纬,万端规矩,无所不贯。”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:“紫宫、房心、权衡、咸池、虚危列宿部星,此天之五官坐位也,为经,不移徙,大小有差,阔狭有常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填星,此五星者,天之五佐,为纬,见伏有时,所过行赢缩有度。”④

《汉书·律历志上》:“绳者,上下端直,经纬四通也。”又:“中央者,阴阳之内,四方之中,经纬通达,乃能端直,于时为四季。”又:“三辰之合于三统……五星之合于五行……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。”

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:“土、木相乘而合经纬为三十,是为镇星小周。”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《安世房中歌》第二章:“清思眇眇,经纬冥冥。”⑤

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《郊祀歌·惟泰元》:“经纬天地,作成四时。精建日月,星辰度理。阴阳五行,周而复始。”

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:“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,相为经纬。八卦、九章,相为表里。”

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上》引京房《易传》:“赋敛不理兹谓祸,厥风绝经纬。”⑥

《汉书·李寻传》:“五经六纬⑦,尊术显士。”

《汉书·扬雄传下》载《法言》序目:“神心眙怳,经纬万方,事系诸道德、仁谊、礼。譔《问神》第五。”

《汉书·王莽传上》载元始五年诏策:“钦承神祇,经纬四时,复千载之废,矫百世之失,天下和会,大众方辑。”(以上史部)

《管子·五行》:“故通乎阳气,所以事天也,经纬日月,用之于民。通乎阴气,所以事地也,经纬星历,以视其离。”

① 郑玄注:“国中,城内也。经纬,谓涂也。经纬之涂,皆容方九轨。”

② 杜预注:“嫠,寡妇也。织者常苦纬少,寡妇所宜忧。”

③ 韦昭注:“天有六气,地有五行。”

④ 张守节《正义》:“五星行,南北为经,东西为纬也。”

⑤ 颜师古注:“经纬,谓经纬天地。”

⑥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:“有所破坏,绝匹帛之属也。”又引晋灼曰:“南北为经,东西为纬,丝因风暴乱不端理也。”

⑦ 此处所谓经纬,均指星宿,详见下文。

万方数据

《庄子·寓言》:“(耆艾)年先矣,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,是非先也。”①

《荀子·劝学》:“将原先王、本仁义,则礼正其经纬、蹊径也。”

《荀子·解蔽》:“参稽治乱而通其度,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。”

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:“凡地形,东西为纬,南北为经。”

《淮南子·要略》:“夫作为书论者,所以纪纲道德,经纬人事,上考之天,下揆之地,中通诸理。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,繁然足以观终始矣。”

《说苑·正谏》:“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廪,合疏缕之纬以成帷幕。”

《太玄·玄测序》:“经则有南有北,纬则有西有东。”

《太玄·应》:“一从一横,经纬陈也。”

《太玄·玄莹》:“东西为纬,南北为经。经纬交错,邪正以分。”又:“立天之经曰阴与阳,形地之纬曰从与横。……阴阳曰合其判,从横曰纬其经。……阳不阴无与合其施,经不纬无以成其谊。”(以上子部)

《离骚》:“纷总总其离合兮,忽纬繣其难迁。”②(以上集部)

从以上史料看,西汉(含)以前的“纬”字使用,除了其本义“织物的横线”外,还有“组织(治理)”、“伦理”、“星宿”、“地理方向上的东西向”这几个衍生义,而绝无“征验”、“纤微”、“秘密”一类含义,与“谶”字之义域界划分明,完全不见用“纬”字明确称呼后世所谓“谶纬”学、“谶纬”书的例证。

而陈槃《谶纬释名》一文,曾举出《小黄门谯敏碑》,以证明“‘纬’之称,大抵可能早推至于昭、宣帝之世”;又举出《华阳国志》的一条材料,云“成帝之世,(“纬”之称)亦有可考者”③。其实都是错解或误读。《小黄门谯敏碑》有云:“(谯敏)其先故国师谯赣,深明典隩、谶录、图纬,能精微天意。传道与京君明。”④谯赣即焦赣(焦延寿),活动于西汉昭、宣、元帝时期,曾传授京房《易》学(见《汉书·京房传》)。问题是,此碑文末分明写有“中平四年七月廿八日癸卯造”,乃是东汉灵帝末年之人所作⑤。其所谓“图纬”,显然不能必然地当作焦赣时代的词语。而《华阳国志》卷十中《广汉士女》所载“王延世,字长叔,资中人也。建始五年,河决东郡,泛滥兖豫四郡三十二县,没官民屋舍四万所。……汉史案图纬,当有能循禹之功者,在犍、柯之资阳求之,正得延世”一条材料,其“汉史案图纬……正得延世”几句话,乃是后人伪造窜入的;其不足为据,任乃强辨之甚力:“‘汉史案图纬’求得延世一节,不见《汉书》。《汉纪》、《通鉴》均不著录。由旧刻注文有‘资阳’二字,可疑此节系隋唐人妄为窜入。《两汉》、《晋》、《宋》、《齐》等史书的《地理(郡县)志》皆只有资中县,无资阳。今资阳县,即汉魏六朝之资中县治。后周始改名资阳,为资州资阳郡治,并分资中为磐石县,属焉。隋徙资州治磐石,资阳县属之。王延世本资中县人,家所在,为周、隋以来之资阳县,此非常璩所及知。……且犍、柯,当指犍为、牂柯两郡。即使‘资阳’为‘资中’钞讹,其地实在犍为之东北,与蜀、广汉近,去牂柯绝远。曰‘犍、柯之资阳’,实不成文。疑是迷信图纬者造此说,窜乱于常氏文中。因其用‘资阳’字,故可疑为隋唐人所为也。”⑥如此,则这条史料中“图纬”之称,当然不可径作汉成帝时词语。

真正有可能被解读为西汉时期以“纬”指称谶纬或谶纬书的,是陈槃未及引证的这条材料:

(李寻)说(王)根曰:“《书》云‘天聪明’,盖言紫宫极枢,通位帝纪,太微四门,广开大道,五经六纬,尊术显士,翼、张舒布,烛临四海,少微处士,为比为辅,故次帝廷,女宫在后。圣人承天,贤

① 成玄英《疏》:“上下为经,傍通曰纬。”

② 王逸注:“纬缅,乖戾也。”《玉篇·糸部》:“缅,乖戾也。”钱杲之《离骚集传》:“纬,织丝也。缅,结碍也。”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:“纬缅,如纬丝之缅结,乖戾不就绪也。”

③ 陈槃:《谶纬释名》,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一本,1944年。

④ 洪适:《隶释》卷十一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。

⑤ 此碑文相传为蔡邕所作,见《通志》卷七十三《金石略第一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六十三《河北道十二》。

⑥ 任乃强: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586页。

万方数据

贤易色,取法于此。”(《汉书·李寻传》)

这里所谓“五经六纬”,孟康、颜师古以为指《五经》纬和《乐纬》,张晏以为指《五经》纬和《孝经纬》。古近多有学者照此理解[①],其实均属望文生义的轻率误读。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引北宋刘攽曰:“正言星宿,何故忽说《五经》?盖谓二十八舍。”可谓一语中的!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之《前汉书卷七十五考证》亦云:“师古用孟康说,而刘攽驳之,谓‘正说星宿,何故忽说《五经》’,其论甚合。”观李寻原文,稍稍思之即不难理解:上下文都是铺陈星宿,则此“五经六纬”,自然不可能作别样突兀的解释。至于“五经六纬”究竟指哪些星宿,则后人说法不同[②]。

在西汉及西汉以前的典籍中,除上述三条曾被误解的材料(其实陈槃所举二条均非西汉史料)外,再也没有其他可能被解释为用“纬”字称呼谶纬或谶纬书的史料了。

据今天所见的史料,到东汉后期,“纬”字已被用作称呼“谶纬”学或“谶纬”书:

> 少以好学,游心典谟。既综七经,又精群纬。钩深极奥,穷览妙旨。居则玩其辞,动则察其变。云物不显,必考其占。故能独见前识,以先神意。(蔡邕《玄文先生李子材铭》)
>
> 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。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,盖发其伪也。有起于中兴之前,终、张之徒之作乎?(荀悦《申鉴·俗嫌》)
>
> 张逸问:“《礼注》曰‘书说’。书说,何书也?”答曰:“《尚书纬》也。当为注时,时在文网中,嫌引秘书,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‘说’。”(《郑志》卷中)
>
> 《春秋纬》云:“河以通乾出天苞,洛以流坤吐地符。”河龙图发,洛龟书感。《河图》有九篇,《洛书》有六篇。(王应麟辑《周易郑康成注·系辞》“河出图,洛出书”郑玄注)

依上可见,东汉后期,用“纬”字称呼“谶纬”学、“谶纬”书,已经比较通行了。至于“纬”字究竟何时开始被赋予这个含义,则因于史料乏征,还不易说得准确,要必在东汉刘秀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之后而不会更早,则似可以断定(详下)。

“谶”之称始于汉初,“纬”之称东汉后期始见,那么“谶纬”凝为一词又在何时呢?

先秦两汉的所有传世文献中,都没有“谶纬”一词;此一词语之最早出处,盖为《三国志》,凡二见:

> (建安二十五年,刘豹、向举等)上言:“臣闻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,《五经》谶纬,孔子所甄,验应自远。……”……(许靖、糜竺、诸葛亮等)上言:“……二祖受命,图、书先著,以为征验。今上天告祥,群儒英俊,并进《河》、《洛》,孔子谶记,咸悉具至。……考省《灵图》,启发谶纬,神明之表,名讳昭著。宜即帝位,以纂二祖,绍嗣昭穆,天下幸甚。”(《蜀书·先主传》)

此为引录刘备诸臣的上奏之言,当可确认为汉末魏初之语。与此时代较近的称呼“谶纬”者有:

> 建武初,博士淮阳薛汉传父业,尤善说灾异谶纬,受诏定图谶。当世言《诗》推为长。(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卷下《韩诗》)
>
> 自诸子谶纬,圣人秘要,莫不引譬取喻。(《弘明集》卷一载《牟子理惑论》)

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书虽不伪,但此书大抵是后人从《毛诗正义》中辑出,且窜乱讹误较多(参见张心澄《伪书通考》)。此数语(尤其“尤善说灾异谶纬”句)与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所述相同,孰为先后,容有可疑。《弘明集》所载《牟子理惑论》,题为“汉牟融”撰。其《序》称“灵帝崩后,天下扰乱”,

---

① 如: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《经说》:“按李寻有‘五经六纬’之言,盖起于哀、平。至光武笃信之,诸儒习为内学。”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七“第九十九”条按语:“读班书《李寻传》,成帝元延中,寻说王根曰‘五经六纬,尊术显士’,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。”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卷十九:“《李寻传》‘五经六纬,尊术显士’,言纬者始见于此。”钟肇鹏《谶纬论略》引据阎若璩以上说法后,谓:“阎若璩推阐张衡之说,认为成帝时已有纬名,而图谶成于哀、平之际,是颇有见地的。”(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1年,第23页)

② 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:“姚鼐云:‘言天文当为人主所取法。此五经者,五经星也。六纬者,十二次相向为六。故人主当法之,以尊五行之术,显十二州之士耳。与经书、谶纬何涉哉?’先谦案:《天文志》:‘太微廷掖门内六星,诸侯。其内五星,五帝坐。’五帝者,《晋志》:‘黄帝坐在太微中,四帝星夹黄帝坐。’盖即五经。六纬者,六诸侯。《天官书》同。盖汉世天文家说如此。姚谓五经为五经星,六纬为十二次,上下文义不属,疑非。”

万方数据

“牟子将母避世”,精研佛道,撰《理惑论》。察《后汉书》本传,牟融卒于汉章帝建初四年,且两汉并无其他以“牟融”知名者,则所谓汉牟融《理惑论》为后人伪托无疑。明人胡应麟已云:“尝疑六朝晋宋间文士,因儒家有牟子,伪撰此论。”(《四部正讹》卷下)因此,《理惑论》所谓“谶纬”,并非汉人言语。

前四史使用“谶纬”一词的,还有《后汉书》,亦仅二见:

(薛汉)少传父业,尤善说灾异谶纬,教授常数百人。建武初,为博士,受诏校定图谶。当世言《诗》者,推汉为长。(《儒林·薛汉传》)

(廖扶)遂绝志世外,专精经典,尤明天文、谶纬、风角、推步之术。(《方术·廖扶传》)

此二条,乃是范史叙述之言,能否当作薛汉(刘秀、明帝时)、廖扶(安、顺、桓帝时)时代的语汇,尚可斟酌。

据上述,今天能够确定的是:“谶纬”一语始见于汉末魏初。其凝为专指名词,尚在以“纬”字指称后世所谓“谶纬”学、“谶纬”书之后。

三、谶纬的思想实质:以谶“纬”经

根据以上梳理,西汉初即有以“谶”字称呼谶书或谶事的情形。而用“纬”字称呼后世所谓谶纬学或谶纬书,西汉及西汉以前尚无例证,这个概念直到东汉后期才出现。至于“谶纬”合称并凝为一专指词,则更要到汉末魏初时才可见到。当然,一个定型概念的出现和通行,往往会晚于它所指称的事实。谶事谶语、谶验观念早在先秦就已流行,而“谶”这个名称西汉初始见。以“纬”或“纬书”称呼后世谶纬学或谶纬书,到东汉后期始见,而经、谶牵合(以谶“纬”经)之事,根据现存史料,则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初期。也就是说,伴随着儒家经学的兴起,以谶“纬”经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《经部·易类六》附录《易纬》案语:“伏生《尚书大传》、董仲舒《春秋阴阳》,核其文体,即是纬书。”此论未必精确,但甚有启发。《汉志·六艺略》尚书类著录“《经》二十九卷,《传》四十一篇”,均为伏生所传。这四十一篇《传》,即《尚书大传》[①]。今观《尚书大传》佚文,依托经典而醇正解释、阐发的文字(即“传”)当然很多,但是其中亦不乏谶验观念(即“谶”)在,与其前后同类的思想观念并无二致。例如:

七政,谓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,所以为政也。人道正而万事顺成。又七政布位,日月,时之正;五星,时之纪。日月有薄食,五星有错聚。七者得失,在人君之政,故谓之为政。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收录(清)孙之騄辑本卷一)

武丁祭成汤,有雉飞升鼎耳而雊。问诸祖己,曰:“雉者,野鸟也,不当升鼎。升于鼎者,欲为用也。无则,远方将有来朝者乎?”故武丁内反诸己,以思先王之道。三年,辫发重译至者六国。(同上卷二)

《崇文总目·书类·尚书大传三卷》云:“伏生本秦博士,以章句授诸儒,故博引异言,援经而申证云。”“援经而申证”,是确认其“传”经(说经)的基本性质;而所谓“异言”,当即指其中谶验之类言语。也就是说,“传”、“谶”集于《尚书大传》一身。这个评论,四库馆臣说得更明确:“其文或说《尚书》,或不说《尚书》,大抵如《诗外传》、《春秋繁露》,与经义在离合之间。……其第三卷为《洪范五行传》,首尾完具,汉代纬候之说,实由是起。”又案云:“《尚书大传》于经文之外,掇拾遗文,推衍旁义,盖即古之纬书。”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二《经部·书类二》附录《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》)“与经义在离合之间”,确是抓准了《尚书大传》基本特质。四库馆臣判定它就是“古之纬书”,此点尚可商酌;但如果说它是纬书之滥觞,亦无不可。今详核《尚书大传》佚文,其“传”经(说经)的目的明确,同时也蕴含着明显的谶验观念。由此可证,汉初即已出现以谶“纬”经,经、传、谶牵合之现象。

伏生活动于汉文帝之前。四库馆臣提到的《(韩)诗外传》,其作者韩婴主要活动于文、景时期,文

① 参见张舜徽: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,《张舜徽集》第一辑,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。

万方数据

帝时立为博士。今存《韩诗外传》佚文中,亦不乏如下一类言论:

国无道则飘风厉疾,暴雨折木,阴阳错氛,夏寒冬温,春热秋荣,日月无光,星辰错行,民多疾病,国多不祥,群生不寿,而五谷不登。当成周之时,阴阳调,寒暑平,群生遂,万物宁。故曰:其风治,其乐连,其驱马舒,其民依依,其行迟迟,其意好好。《诗》曰:"匪风发兮,匪车揭兮,顾瞻周道,中心怛兮。"①

有殷之时,谷生汤之廷,三日而大拱。汤问伊尹曰:"何物也?"对曰:"谷树也。"汤问:"何为而生于此?"伊尹曰:"谷之出泽,野物也。今生天子之庭,殆不吉也。"汤曰:"奈何?"伊尹曰:"臣闻:妖者,祸之先;祥者,福之先。见妖而为善,则祸不至;见祥而为不善,则福不臻。"汤乃齐(同斋)戒静处,夙兴夜寐,吊死问疾,赦过赈穷,七日而谷亡。妖孽不见,国家其昌。《诗》曰:"畏天之威,于时保之。"②

《韩诗外传》中此类话语甚夥,其与《尚书大传》性质基本相同,均为以谶"纬"经(以谶说经)之属。景帝、武帝以还,以谶"纬"经之事持续存在。《汉书·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》云:

幽赞神明,通合天人之道者,莫著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……汉兴,推阴阳言灾异者,孝武时有董仲舒、夏侯始昌;昭、宣则眭孟、夏侯胜;元、成则京房、翼奉、刘向、谷永;哀、平则李寻、田终术。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。察其所言,仿佛一端。假经设谊,依托象类,或不免乎"亿则屡中"。

这里举出的景、武之后的"推阴阳言灾异者",其实也就是常常牵合经(多为《易》、《春秋》)、谶以议论时事者。所谓"假经设谊(义),依托象类",就是指出了这个思想特点。

这些人物中,最应注意的是"一代儒宗"董仲舒。董仲舒的著作,今仅存残缺的《春秋繁露》,以及史籍中引述的片段文字。不过,仅由此残存文字,仍可见到他牵合经、传、谶的思想特征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大量记载春秋时期的星象异变、地震、水旱及其他种种灾异,往往引述董仲舒的解说。而这些解说,明显都是以天人感应的谶验观念来解释春秋史迹,以推阐《春秋》经之"大义"。其《春秋繁露》,借《春秋》经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,思理醇正(即苏舆所谓"说经体",其实就是"传"之一种),与《五行志》作为专题记录神秘征验之内容者有很大不同,但也不乏谶验思想。略举二例以证:

《春秋》何贵乎元而言之?元者,始也,言本正也;正③,王道也;王者,人之始也。王正,则元气和顺、风雨时、景星见、黄龙下;王不正,则上变天,贼气并见④。五帝三王之治天下,不敢有君民之心,什一而税,教以爱,使以忠,敬长老,亲亲而尊尊,不夺民时,使民不过岁三日,民家给人足。……故天为之下甘露,朱草生,醴泉出,风雨时,嘉禾兴,凤凰麒麟游于郊。……周衰,天子微弱,诸侯力政,大夫专国,士专邑,不能行度制、法文之礼。诸侯背叛,莫修贡聘奉献天子。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孽杀其宗,不能统理,更相伐铓以广地。以强相胁,不能制属。强奄弱,众暴寡,富使贫,并兼无已。臣下上僭,不能禁止。日为之食,星陨如雨。雨螽。沙鹿崩。夏大雨水,冬大雨雪⑤。陨石于宋五,六鹢退飞。陨霜不杀草。李梅实。正月不雨,至于秋七月。地震,梁山崩,壅河三日不流。昼晦。彗星见于东方,孛于大辰。鹳鹆来巢。《春秋》异之,以此见悖乱之征。(《王道》)

四法修于所故⑥,祖于先帝,故四法如四时然,终而复始,穷则反本。四法则天⑦,施符授圣

① 许维遹:《韩诗外传集释》卷二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74页。

② 许维遹:《韩诗外传集释》卷三,第80-81页。

③ "正",原作"道",据苏舆《义证》校改。

④ 《管子·四时》:"春凋、秋荣、冬雷、夏有霜雪,此皆气之贼也。刑德易节失次,则贼气遽至;贼气遽至,则国多灾殃。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,作教而寄武焉,作祀而寄德焉。此三者,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。"

⑤ "夏大雨水"二句,苏舆《义证》疑本当作"大雨震电,又大雨雪"。

⑥ "四法",即下云"主天法商而王"、"主地法夏而王"、"主天法质而王"、"主地法文而王"。

⑦ "则",原作"之",据苏舆《义证》校改。

万方数据

人;王法则性命,形乎先祖,大昭乎王君。故天将授舜,主天法商而王,祖锡姓为姚氏。至舜形体,大上而员首,而明有二童子,性长于天文,纯于孝慈。天将授禹,主地法夏而王,祖锡姓为姒氏。至禹生,发于背,形体长,长足胝,疾行先左,随以右,劳左佚右也。性长于行,习地明水。天将授汤,主天法质而王,祖锡姓为子氏。谓契母吞玄鸟卵生契,契生[①],发于胸,性长于人伦。至汤,体长专小,足左扁而右便,劳右佚左也。性长于天光,质易纯仁。天将授文王,主地法文而王,祖锡姓姬氏。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。后稷长于邰土,播田五谷。至文王,形体博长,有四乳而大足,性长于地文势。故帝使禹、皋论姓,知殷之德阳德也,故以子为姓;知周之德阴德也,故以姬为姓。故殷王改文,以男书子,周王以女书姬。故天道各以其类动,非圣人孰能明之?(《三代改制质文》)

《王道》所述,是董子典型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思想。其《必仁且智》篇精练地阐述了灾异之于国家政治的关系:"天地之物,有不常之变者,谓之异;小者谓之灾。灾常先至,而异乃随之。灾者,天之谴也;异者,天之威也。谴之而不知,乃畏之以威。……凡灾异之本,尽生于国家之失。国家之失乃始萌芽,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;谴告之,而不知变,乃见怪异以惊骇之;惊骇之,尚不知畏恐,其殃咎乃至。"此种天有意志、权威及谴告、惩戒功能的天人感应观念,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,与谶纬当中的"天文占"、"五行占"无论在表述上还是思想理路上,均无本质区别。

《三代改制质文》讲的是君权天授的思想。其《符瑞》篇所谓"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,西狩获麟,受命之符是也。然后讬乎《春秋》正不正之间,而明改制之义",说孔子受天命撰著《春秋》以明改制之义,"西狩获麟"便是其征象("受命之符")。与上面引文中舜"大上而员首,而明有二童(瞳)子",禹"生发于背"、"疾行先左随以右","契母吞玄鸟卵生契"、"契生发于胸"、"足左扁而右便","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",文王"四乳而大足"等等受命之征象,都出于同一思理,与谶纬中的符命思想如出一辙,无非都是牵合天人以"考命、象之为"(《符瑞》)罢了。

卢文弨曾说:"此书之大旨在乎仁义,仁义本乎阴阳。……董子之论,固非倚于一偏者。"(苏舆《春秋繁露义证》附录《春秋繁露考证》之《四库馆奏进书后》卢氏案语)《春秋繁露》依托《春秋》经以建构其"三科九旨"之思想体系,其大体为醇正的"传"(说经体)无疑;同时,它贯穿着阴阳五行思想观念,以天人感应作为其社会政治伦理之基本原理,并讲述神秘的谶验之事以为论断,存在与先秦谶言性质不二者。因此,《春秋繁露》的基本性质,因其具有依托《春秋》经进行的醇正思想体系的建构,自然不可像四库馆臣那样径指为(谶)纬书,但其思想建构的基础思路及其结撰方式,在纠合经、传、谶于一体方面,与《尚书大传》、《韩诗外传》实无本质不同。如果说《尚书大传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春秋繁露》一类著述就是(谶)纬书,固然言之太过;但若说它们是后世纬书之滥觞,当不为无据[②]。

董仲舒之后,眭孟、刘向、京房、翼奉、谷永、李寻等,大抵都是沿着牵合经、谶的路数展开他们的政治思想活动。

到两汉之际以至东汉,以谶"纬"经(以谶说经)之事更是风起云涌,学者多不胜举,《后汉书》所记述"善图纬"、"善图谶"云云者都是。在这一思想潮流中,以下三个结点尤具重要意义:

(1)(刘秀中元元年)宣布图谶于天下。(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下》)

此事的重大意义在于,刘秀作为刘汉王朝功勋卓著的中兴帝王,郑重、正式地向天下宣布图谶,以强势的政治行为,极大地提升了图谶的思想文化地位,使之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纲领之一,对后汉

① "生",原作"先",据苏舆《义证》校改。

② 章太炎之说亦可为佐证:"及燕、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,说经者多以巫道相糅,故《洪范》,旧志之一篇耳,犹相与抵掌树颊,广为抽绎。伏生开其源,仲舒衍其流。是时适用少君(翼奉)、文成(齐人少翁)、五利(胶东人栾大)之徒,而仲舒亦以推验火灾,救旱止雨,与之校胜,以经典为巫师豫记之流。而更曲傅《春秋》,云为汉氏制法,以媚人主,而梦政纪。……(自尔)巫道乱法,鬼事干政,尽汉一代,其政事皆兼俪神道。"(《太炎文录初编》卷二《驳建立孔教议》,《章氏丛书》下册,台北:世界书局,1982年影印本)

万方数据

的政治文化乃至一般思想文化都具有强力的指引甚至规范作用。尽管章帝之后,古文经学逐渐兴起[①],但是由刘秀颁布的图谶政治思想始终不曾衰歇。与此相伴随的,自然是一班学者的趋之若鹜,苏竟、杨厚、郎顗、襄楷等,即是代表。还有醇正儒者如贾逵,也因趋奉图谶之学,而颇遭病诟。而那些明显不甚合作的学者如桓谭、郑兴、尹敏等,则遭受冷遇[②]。如此,导致东汉时期上上下下莫不弥漫着图谶政治思想文化的气氛。与此相关的另一事,也须明确:刘秀正式向天下宣布图谶之前,必然经过整理。其整理之详情,史籍虽无专门记载,但痕迹犹存: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之《尹敏传》:"帝以(尹)敏博通经、记,令校图谶。"(《后汉纪》卷八、《东观汉记》卷十六均载此事)又《薛汉传》:"建武初,为博士,受诏校定图谶。"此可说明,刘秀末年宣布的图谶,必然是比较完整而系统的,不会像今天所见之谶纬佚文那样零散错乱。

(2)(明帝永平三年)秋八月戊辰,改大乐为大予乐。(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)

此事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记载较详:"显宗即位,(曹)充上言:'汉再受命,仍有封禅之事,而礼乐崩阙,不可为后嗣法。五帝不相沿乐,三王不相袭礼,大汉当自制礼,以示百世。'帝问:'制礼乐云何?'充对曰:'《河图括地象》曰:"有汉世礼乐文雅出。"《尚书璇机钤》曰:"有帝汉出,德洽作乐,名予。"'帝善之,下诏曰:'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。'"礼乐制度的设立或改革,是王朝政治建设的大事。此事的重要意义是,它是依据图谶之说改革制度的重大政治实践,对后世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。而所依据的《河图括地象》、《尚书璇机钤》,应当就在刘秀所宣布的图谶之中。明帝刘庄学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,亦钟情图谶。永平十八年(75)十一月发生日食,有司上疏章帝,有"(明帝)聪明渊塞,著在图谶"之语(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)。其具体所指,李贤注已揭出:"《河图》曰:'图出代,九天开明,受用嗣兴,十代以光。'又《括地象》曰:'十代礼乐,文雅并出。'谓明帝也。"这可能正是明帝重视图谶并据以改革礼乐制度的深刻、隐秘的原因。也因此,明帝常常牵合经、谶。如《东观汉记》卷十一《樊准传》云:"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,游意经艺,删定乖疑,稽合图谶。……亲自制作《五行章句》。每享射礼毕,正坐自讲[③]。"明帝诏书亦往往"稽合图谶"[④],如永平八年十月发生日食,明帝下诏曰:"朕以无德,奉承大业,而下贻人怨,上动三光。日食之变,其灾尤大,《春秋》图谶所为至谴[⑤]。永思厥咎,在予一人。"(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)明帝朝修订国家大典礼仪,也是经、谶互参,如《后汉书·樊儵传》载:"永平元年,(儵)拜长水校尉,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,以谶记正《五经》异说。"

刘秀、刘庄是东汉王朝最具影响力的君主,所谓"后之言事者,莫不先建武、永平之政"(《后汉书·明帝纪论》)。刘秀讲论经典乐而不疲,同时向天下颁布了图谶定本;刘庄"博贯六艺"而"稽合图谶",示范经、谶牵合互释之思路。他们这种政治文化取向,必然对东汉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和规约。

(3)(建初四年十一月,章帝下诏"使诸儒共正经义")将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,讲议《五经》同异,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,侍中淳于恭奏,帝亲称制临决,如孝宣甘

① 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:"肃宗立,降意儒术,特好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。建初元年,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、南宫云台。帝善逵说,使发出《左氏传》大义长于二传者。逵于是具条奏之曰……书奏,帝嘉之,赐布五百匹,衣一袭,令逵自选《公羊》严、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,教以《左氏》。……逵数为帝言《古文尚书》与经传《尔雅》诂训相应,诏令撰《欧阳》、《大小夏侯》、《尚书古文》同异。逵集为三卷,帝善之。复令撰齐、鲁、韩《诗》与《毛氏》异同。并作《周官解故》。……八年,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,受《左氏》、《穀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,由是四经遂行于世。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,朝夕受业黄门署,学者皆欣欣羡慕焉。"由此可见章帝于喜好图谶之同时,亦倾心扶助古学。

② 参见《后汉书》各自本传。又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论曰:"桓谭以不善谶流亡,郑兴以逊辞仅免,贾逵能附会文致,最差贵显。世主以此论学,悲矣哉!"

③ 《后汉书·桓郁传》:"(明)帝自制《五家要说章句》,令郁校定于宣明殿。"李贤注:"《华峤书》曰'帝自制《五行章句》',此言'五家',即谓五行之家也。……其冬,上亲于辟雍,自讲所制《五行章句》已,复令郁说一篇。"

④ 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四"汉帝多自作诏"条,云东汉光武、明帝、章帝多自作诏书。可参。

⑤ 李贤注:"《春秋感精符》曰:'人主含天光,据玑衡,齐七政,操八极。'故君明圣,天(一作"人")道得正,则日月光明,五星有度。日明则道正(道正,一作"政理"),不明则政乱,故常戒以自勑厉。日食皆象君之进退为盈缩。当春秋拨乱,日食三十六,故曰'至谴'也。"

万方数据

露石渠故事，作《白虎议奏》。（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）

根据章帝诏书，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缘起，是“中元元年诏书（按《光武帝纪》未载），《五经》章句烦多，议欲减省”之事一直未能实行，现在要完成“先帝大业”①。其目的，是通过“讲议《五经》同异”，来统一经义、统一思想。如此看来，这是一次具有思想“战略意义”的严肃醇正的经学研讨会。关于此次会议的结集，相关文献中出现《白虎议奏》（见上）、《白虎通德论》②、《白虎通义》③三个不同名称。一般认为，《白虎议奏》是会议纪要，是原始记录；而《白虎通德论》、《白虎通义》是一种书，即《白虎通》，是思想统一之后的决议④。那么，这份天下鸿儒参与讨论并经章帝亲临决议的经学纲领性文献，究竟是怎样的状貌呢？庄述祖《白虎通义考》言之甚精当：“《白虎通义》杂论经传……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六艺并录，傅以谶记，援纬证经。自光武以《赤伏符》即位，其后灵台郊祀，皆以谶决之，风尚所趋然也。故是书之论郊祀、社稷、灵台、明堂、封禅，悉隐括纬候，兼综图书，附世主之好。”⑤“傅以谶记，援纬证经”，的确是其重要思想特征。白虎观会议及其思想成果《白虎通》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继承刘秀尤其是明帝以来经、谶牵合的思想取向之基础上，又进一步把经、谶牵合互释的思想原理及其系统的思想成果，以国家思想“法典”的形式固定下来，成为东汉王朝最崇高的统治思想。

关于刘秀、刘庄、刘炟持续的政治思想建构，以下两点尤须突出强调：

其一，如果说刘秀的颁布图谶，乃是凭借政权威势强行确立图谶崇高的政治思想地位，那么，明帝刘庄的“游意经艺，删定乖疑，稽合图谶”，则是在学理上通过经、谶牵合互释来巩固图谶的既定地位。刘庄较刘秀的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——在学理上进一步强化经、谶牵合互释之思想途径，既巩固了图谶的地位，也成为天下学者思想取向的有力指引（贾逵于明帝时上言《左传》与图谶相合者若干事，明帝“写藏秘馆”，即是显例）。到章帝刘炟再进一步，将经、谶结合的《白虎通》确立为国家政治伦理之“法典”，也使经、谶牵合互释成为了“法定”正统的思想途径。而经、谶牵合之滥觞，乃发自汉初，其后流衍未绝；唯东汉明、章二帝更张煌其事，赋予其神圣不可侵犯之思想地位。

其二，刘秀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，乃是以中央政令的形式颁布思想文化纲领，必然是审慎的。其称为“图谶”，而并未称“纬”。刘庄、刘炟的时代也只称“图谶”而不曾称“纬”。《白虎通》称引“《春秋谶》”、“《孝经谶》”、“《论语谶》”以及“谶曰”各一次；用“纬”字仅一次，见于《封禅》：“德至文表（当作“八表”），则景星见，五纬顺轨”⑥，指五行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虽没有像《隋志》、两《唐志》那样明确列出“谶纬”一类，但其《数术略》所录图书中，恐有与后世所谓谶纬难逃千丝万缕之联系者⑦，而绝无“纬”或“谶纬”之称。据此种种情形，可以推断：东汉至章帝时期，尚无“纬”之名称。若再参考张衡《请禁绝图谶疏》只称“谶书”、“谶”、“图”、“图谶”而不称“纬”及“谶纬”的情形，则似至东汉中期仍无“纬”之名称。

结　语

本文穷蒐先秦两汉典籍及其他相关史料，并辅以必要的考辨，已大抵勾勒出汉代谶、纬分合演变

① 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：“终又言：‘宣帝博征群儒，论定《五经》于石渠阁。方今天下少事，学者得成其业，而章句之徒，破坏大体。宜如石渠故事，永为后世则。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。”

② 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：“天子会诸儒讲论《五经》，作《白虎通德论》，令固撰集其事。”

③ 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：“建初中，大会诸儒于白虎观，考详同异，连月乃罢。肃宗亲临称制，如石渠故事，顾命史臣，著为通义。”李贤注：“即《白虎通义》是。”但此书通行的称呼是《白虎通》。正式的《白虎通义》之名，似是到唐代始见。如《旧唐书·礼仪志》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太常博士张齐贤上疏称引“《白虎通义》”，《新唐书·黎干传》亦曾称引“《白虎通义》”。至史志目录，唯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称“班固等《白虎通义》六卷”，馀则皆称“《白虎通》”。

④ 参见陈立：《白虎通疏证》附录庄述祖《白虎通义考》、刘师培《白虎通义源流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4年。

⑤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云：“书中征引六经、传记而外，涉及纬、谶，乃东汉习尚使然。”

⑥ 《礼记注疏·礼运》孔颖达《正义》引《援神契》：“德至八极，则景星见。”

⑦ 如其“天文”类所著录的二十二种图书，明显可知其基本内容即为星占。其“五行”类、“杂占”类，以及《兵书略》中的“兵阴阳”类等，也大有类似今存之谶纬书者。

万方数据

比较明晰的轨迹。今将主要观点总结于次：

就事实而言，谶验（征验）的行事和观念，自春秋至汉末从无间断。其具体表现，如以今天所见之谶纬书的主要内容来衡量，则所谓“天文占”、“五行占”、“史事谶”等等，春秋以来一直都持续不断。刘汉四百年之中，亦是如此。惟入汉之初，儒学复兴而终于独尊。因而以谶“纬”经之事，便伴随经学兴起而出现，至东汉初年大盛，终至登堂入室，经、谶牵合互释的思想（及思想方法）取得正统而崇高之地位。就名称而言，“谶”之称始见西汉初年，“纬”之称始见东汉后期，“谶纬”之称始见汉末魏初。

以上为两汉谶、纬名实之大势。然谶、纬名实之间的分合纠结，以及密切相关的谶纬起源问题，犹有当分说者：

其一，对谶而言，乃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。谶验之事实自春秋以来一直存在，而“谶”名迟滞，到西汉初年始见，而名实相合。

其二，对纬而言，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。东汉后期称为“纬书”者，其实并不存在。“纬”的本义是“反复围绕以成经”，从言说（著述）的意义而言，“纬”是指对经典的阐释活动，而并非一种文类书体。注释、解说甚或醇正地发挥经典的著作，本称之为“传”（如《毛诗故训传》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尚书大传》等），而不称“纬”。然则东汉后期何以出现“纬书”之称？根据本文考述，西汉初年伴随着儒家经典的逐步确立，随即出现了以谶“纬”经的学术思想实践，两汉四百年一直不曾间断。在长期的以谶“纬”经实践下，尤其在东汉初年三代帝王的强势引导下，以谶“纬”经已经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方式和话语方式。为了高尚以谶“纬”经之事，遂将以谶“纬”经的思想成果即称为“纬”，以与“经”相对并峙——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。因此，所谓“纬书”者，必当以经、谶牵合互释并且在思想理念上偏重于谶为其特征。这样的东西，实质上就是谶书①，径称之为“谶”可也。它与依托于经的醇正的“传”（如《毛诗故训传》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春秋繁露》等）是很不相同的。

其三，至于“谶纬”之称，可能正是鉴于“纬”之远离“传”而偏向“谶”（以谶“纬”经）的实际，而发明的一个更加能够显示所谓“纬书”实质又不失尊贵的名称，故比较后起。

其四，以谶“纬”经，是辨识两汉谶纬的根本标志；单纯的谶验故事不是谶纬。因此有汉之前不得有谶纬；魏晋之后，如只是谶验占测而与经学无关，亦不得目为谶纬。在两汉，以谶“纬”经的实践，乃始于文帝时期，彼时便是谶纬的源头。因此，历来通行的“谶纬始自哀、平之际”的说法，不仅曲解了张衡（见文首），也与西汉的思想发展实际不符，是不准确的。

总而言之，据史实看来，“谶”、“图谶”一类东西，自春秋至汉末魏初一直是存在的，其基本性质在各个时代并无实质的差别；只不过到汉代以后与儒经牵合互释，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而已。而所谓“纬书”，事实上并不存在。东汉后期称为“纬”或“纬书”的东西，实质上就是以谶“纬”经的谶书；尊称为“纬”，乃自我高尚耳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，谶、纬之名实纠结复杂，唐代以来“谶纬有别”和“谶纬无别”两种观点，都失于粗陋，缺乏历史的翔实考梳。

[责任编辑　刘　培]

万方数据

① 本文“纬即谶”之判断，结论虽与主张“谶纬一也”的学者貌似相同，但内在思理绝然相异。慧心自明。